

渭南地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党史资料座谈会集

中共渭南地委党史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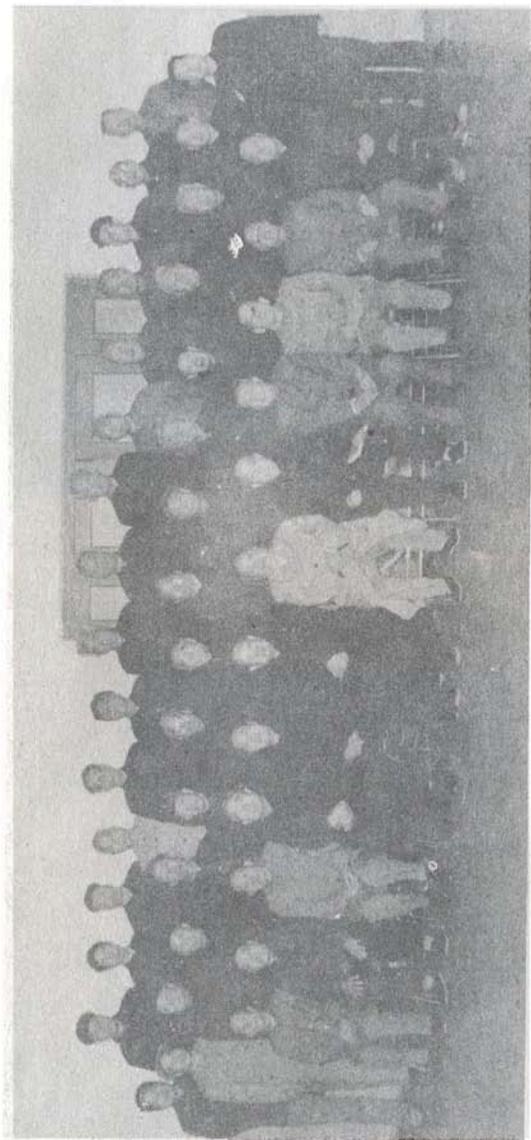
渭南地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党史资料座谈会集

中共渭南地委党史资料  
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资料)

中共渭南地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参加座谈会的老同志和部分有关同志合影。从右至左，第一排：张济伦、孟树林、张凤歧、吕剑人、高克林、汪锋、张策、刘庚、**刘邦显**、邵武轩、白云峰、王中林；第二排：党俊民、薛明斋、段杰、孙昶、汪家滨、张振侯、张铤、权秉华、王生荣、杨培财、王博、赵群、刘玉堂、刘思智、程远、王品堂；第三排：马宝庆、王洪谦、李生荣、杨力生、薛永清、刘朱梁、孙石亦、吴沙浪、张超、王杰、赵亦如、杨中哲、石学友、王少民、侯逢宽。



大会会场一角。



大会会场一角。



大会会场一角。



中顾委委员高克林同志（右）和中共  
渭南地委书记张济伦同志亲切握手。



中共渭南地委副书记王中林同志  
(前右)主持大会。前左是中顾委委员  
汪锋同志。



中共渭南地委副书记石学友同志  
(前左)向与会的老同志汇报工作。前  
右是中顾委委员张策同志。



东路组的老同志在考订史料。



中共渭南地委顾问、地委党史资料征委会主任白云峰同志（右二）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

（本组照片摄影：孔令成）

## 编者的话

去年十月，我区召开了有三十五位老同志参加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党史资料座谈会。与会老同志以亲见亲闻和亲身经历的大量生动具体的事实，回忆追述了我区这两个时期的主要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的重要活动。他们不仅提供和核正了史料，还普遍联系实际，阐明了征集党史资料必须拨乱反正，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反映白区党的作用及其同边区党的关系，必须以先烈的高风亮节、以天下为己任的献身精神启迪教育后来人。这些语重心长的教诲，为我们征集研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的党史资料开辟了航道，标出了航标。

为了正确反映这次空前的盛会，全面系统地汲取教益，特将老同志在大会上的主要讲话、谈话汇成《渭南地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时期党史资料座谈会集》。讲话、谈话的排列是以时为止的。对老同志在分组会上的发言，我们已整理出一部分，将陆续送审。待核正后配合党史专题资料的征研，择要在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办的《党史资料通讯》上发表。

由于我们编辑水平不高，虽作了大量工作，但疏漏错讹之处难免，请赐教指正。

## 目 录

- 在渭南地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党史资料座谈会开幕时致的欢迎词……张济伦（1）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一日）
- 在渭南地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党史资料座谈会开幕时的讲话……白云峰（5）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一日）
- 研究党史必须拨乱反正……中顾委委员 张 策（12）**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一日）
- 对渭南地区党史资料座谈会工作小组**  
**成员的谈话……中顾委委员 常黎夫（18）**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
- 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好地下党时期的**  
**遗留问题……中顾委委员 汪 锋（21）**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六日）
- 谈谈洛川特委同渭南党组织的联系**  
……中顾委委员 高克林（30）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六日）

## 抓紧做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吕剑人 (35)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七日)

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中的几个方法问题……………刘 庚 (53)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七日)

谈谈地下党的历史作用问题……………刘邦显 (60)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七日)

回忆洛特在澄、合一带的组织和游击

活动……………孟树林 (70)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七日)

在渭南地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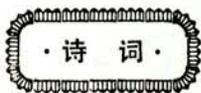
党史资料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白云峰 (80)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七日)

渭南地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党史资料座谈会的情况及体会……………

……………中共渭南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84)



悼念许权中同志……………汪 锋 (93)

九三起义……………刘朱梁 (94)

浣溪沙 记渭南地区党史资料座谈会……………马宝庆 (95)

# 在渭南地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史资料座谈会开幕时致的欢迎词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一日)

张 济 伦

同志们：

渭南地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史资料座谈会今天正式召开，这是我区党史工作上的一次盛会。我代表渭南地委向出席这次座谈会的各位老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表示热烈的欢迎！

渭南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地区。在革命战争年代，这里的党组织领导着人民群众对凶恶的敌人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许多共产党人把热血洒在了这片英雄的土地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座的革命老前辈当年出生入死，浴血奋

战，亲身参加和领导过这个地区的斗争，你们的光荣业绩载入了渭南地区的革命史册。渭南地区人民永远铭记着革命前辈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同时，也热切地期望能编写出一部真实、系统、完整的渭南地区党史，把党领导渭南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把革命英烈可歌可泣的事迹和高风亮节记录下来，作为革命理想和传统的生动教材，教育今人，传之后代，永远激励人们为中国和世界革命而英勇奋斗。

建国以后，当年在渭南地区战斗过的老同志虽已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但出于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对渭南地区的深厚感情，在繁忙的工作中，不仅继续关心着我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而且把搞好渭南地区的党史工作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对此，我们十分钦敬和感谢。

加强党史工作，是思想理论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设两个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意义十分深远。为此，就要按照“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存真求实，立好、立准确党史资料，这是党史研究工作中一件打基础的大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党史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通过我区各级党史资料征集研究部门的共同努力，我区的

征研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是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要解决好这些问题，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各级党史资料征研部门的建设，充分调动党史工作者的积极性，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另一方面，也非常需要取得各个方面的帮助，特别是老同志们的支持和指导。

在座的各位老同志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渭南地区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这个革命斗争阶段的直接参加者和历史见证人。这次邀请大家来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座谈讨论，切磋问题，互相印证，考订史实，基本弄清这两个时期我区党的组织状况、活动范围、重要会议和主要斗争情况，为立好、立准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专题党史资料奠定良好的基础。这次座谈会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向各位老前辈学习的良好机会，希望大家能对我区的党史资料征研工作和其它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同志们！在不久前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上，胡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团结奋斗，再展宏图”的伟大号召。我们相信，在这个精神的鼓舞下，经过各位老同志的共同努力，这次座谈会一定能取得丰硕的成果，我们渭南地区的党史资料征研工作一定能开创出新的局面！

这次会议时间短，活动安排比较紧，希望各位老同志多保重身体。对于我们在会议和生活等方面安排不周到的地方，请及时告诉我们，以便尽快改进和解决。

# 在渭南地区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时期党史资料座谈会开 幕时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一日)

白云峰

我从渭南地区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方面说几句话，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征集研究渭南地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史资料，是一项艰巨、复杂而又紧迫的任务，在座的各位老同志对此体会尤深，有的同志早在去年五月就提出召开座谈会来探讨这两个时期渭南地区党史资料的要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在中国现代革命斗争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此期间，渭南地区党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指示，采取灵活多样的办法，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动员群众参加革命

斗争，建立了光辉业绩。

第一、从声援西安事变至智取华山，在这里曾发生过八路军东渡抗日，保卫黄河之战，澄合战役，荔北战役，永丰战役，康庄战斗及其它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解放战争中，大关中游击战争最活跃的是韩、合、澄、白、铜、富（平）、乾、礼、麟、彬等十县，其中就有五县属我区所辖。

第二、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朱德、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刘伯承、邓小平、王震等在我区均有活动。渭南党组织建立的红色交通线，先后护送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安全地通过了这个地区，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第三、建立了沿河地委、蒲城中心县委、渭南工委、东府特委、路东工委、东路工委等党的组织，同时建立了路东纵队、韩宜支队、韩城支队、合阳支队、澄城支队、朝邑支队等重要革命武装，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革命干部，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人民支援前线斗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四、渭南各地党组织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党在这两个时期的路线、方针、策略和统一战线政策，在关键时刻经受了严峻考验。

第五、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党领导

全国人民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光辉灿烂的时期，也是渭南党组织发展、壮大和走向成熟的重要历史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通过这两个时期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对于总结历史经验，加坚我区两个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渭南地委对于开展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时期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极为关注，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同志尽力地回忆自己当年火热的战斗生活，指导我区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

这次座谈会早在去年就作过酝酿。今年元月，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就召开两个时期座谈会问题，向地委写了报告，有关领导同志作了批示。数月来，地委党史办依照批示精神，查阅、征集了一部分资料，摘录了有关大事资料，走访了一些当事人，拟出了《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史资料专题征集研究计划》，为座谈会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现在，就会议的开法和我区前几年党史资料征集情况，向与会同志作一个简要汇报。

#### 一、会议开法：

这次党史资料座谈会的目的在于，通过座谈讨论，切磋问题，互相印证，考订史实，补充资料，基

本弄清两个时期我区党的组织状况、活动范围、重要会议和主要斗争情况。为立好、立准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专题党史资料奠定良好的基础。

会议主要任务是：①审查《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史资料专题征集研究计划》；②审阅、核实《渭南地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时期党的大事摘录》（征求意见稿），为编写两个时期的大事记述提供准确史料；③座谈沿河地委、蒲城中心县委、渭华工委、东府特委、黄南工委、韩合澄地委、蒲澄工委、蒲白工委、富铜工委、渭北工委、路东工委、华潼工委、东路工委、朝平工委的组织状况、活动区域和斗争史实；④核实武装力量发展、变化及主要战斗情况；⑤听取老干部对我区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的意见和希望。

会议的开法，以阅审资料、小组座谈为主，只在会议开始及结束时召开两次大会。

二、几年来我区党史资料征集研究情况：

渭南地区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八二年七月至一九八三年五月，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建立各级征集机构，组建专业队伍，广征博采党史资料。这一阶段，地委及各县

(市)委均建立了党史资料征集机构,配备了专职干部。截止目前,全区党史资料征研专业人员已有六十六人。各县(市)相继建立起了党史资料征集网,为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力量,全面扎实地征集党史资料打下了良好基础。

第二阶段,从一九八三年五月至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转入重点征集和专题研究,进一步打开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新局面。全区党史工作者以满腔的热忱,承担了六十二个重点专题资料的征集研究任务,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已基本理清了一、二战时期的党史资料,整理出一批具有一定价值的专题资料。其中省上分配的十四个重点专题已完成十二个。

今年元月以来,经过整党,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党史资料征研工作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有关规章、制度,使我们的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把征集、整理和编纂有机地结合起来,已开始编纂党史专题资料集。与省征委会及兄弟地(市)合编的《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渭华起义》两个专题正交付重要当事人审稿;由地委党史办主持编写的《大革命时期渭南地区的农民运动》已把主体材料梳

理完毕，年内可以完成初稿；《红二十六军专题资料集》中，我区承担的“一九三二年陕甘游击队来韩活动”，“红二团骨干在渭华的隐蔽斗争”以及“一九三五年骑兵团在白、澄、合、韩的游击活动”等专题已经脱稿，做到了“门前清”。在利用征研成果方面也有了新的进展，去年和今年“七一”，先后编写出了《渭华起义》、《大革命时期和二战初期我区在全省颇有影响的八件大事》两份宣讲材料，利用党史资料作为生动教材，向广大党员干部、青年进行教育，同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效果。

今年三月，地委以〔1985〕10号文件转发了地委党史征委会《关于第四次全区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各县（市）委贯彻文件精神，专门讨论了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地、县（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在有关会议上，就党史资料征研工作讲了话。大多数县（市）制定了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专题征研工作正在积极而又稳步地进行。

现在，中央发出了指导党史资料征集和整理工作的中办发〔1985〕40号文件。这个文件反映了党史资料征集和整理工作的主要经验，体现了中央领导同志

关于加强党史资料征集和整理工作的指示精神，更加完整地提出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工作任务和今后十年的工作轮廓，这是我们党史资料征研工作长期的指导方针。我相信，在中央40号文件精神指引下，我们渭南地区的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必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就谈这些。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 研究党史必须拨乱反正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一日)

中顾委委员 张 策

现在研究党史，我看在一定程度上同拨乱反正有相当的关系。我们陕西党在审干时闹过什么“红旗党”，在“社教”和“文化大革命”中又闹过“三条黑线”！这“三条黑线”一时间弄得非常严重，多少人因为被株连而受到了打击，甚至弄得家破人亡。所谓“三条黑线”，一条就是“地下党黑线”，你（白云峰）刚才讲的都属于地下党的历史，都是说明这些地下党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是红线而不是黑线。弄清了这里的党史，也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另一条“黑线”叫做“三十八军黑线”，你（白云峰）刚才讲的某师是友军，（白云峰同志：是李兴中的一七七师，许权中同志当参谋长。）对，是一七七师。杨虎城在陕西当权时留下了三十八军，即孙蔚如的部队、赵寿山的部队，总称十七路军。杨虎城及其

军队和我们党是久有关系的，一直到后来孔从周就起义了！么！能说这个三十八军是一条黑线吗？有好多人被株连进了这条“黑线”，也应该经过党史的清理把它说清楚。再一条是“彭、高、习黑线”，这在我们陕西是个“独创”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整的人也更多！这“三条黑线”及其后果，对于陕西党的革命历史是一个对立的東西，要肯定我们的历史是革命的，就必须否定这“三条黑线”，这是两个不能并存的东西。所以我说，这次会议要研究的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党史，与拨乱反正不是没有关系的。

这次会议，经过历史的调查、研究，已经作了基本的准备，从而有条件确定一个组织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首先应当弄清楚这个问题。陕西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的破坏，据我了解，陕西省委就多次被破坏，但又多次恢复。渭南地区可能也有这种情况。这当中就难免出几个叛徒，叛徒应当查出来，好同志应当保护。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包庇叛徒，也决不能误伤好同志，更不能因为某地出过叛徒就否定那个地方整个党的历史。就拿西安来说，西安确实有长期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历史。如果我们这个党不是革命的，就不可能有西安轰轰烈烈的革命历史和群众的革命运动。所以，应当实事求是、真实地反映历史。

写历史要讲真话，要春秋笔。在座的都是当代人，我们当代人写我们党当代的历史，这是过去旧社会、旧统治者做不到的。“二十四史”差不多都是后代人写的，一代一代大都由后代人写。那时当代人写当代的历史是很困难的，应贬的难贬，应褒的难褒。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他只能写到后周，不能写宋。明的历史是清写的。我们党是奉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们当代人写我们当代的历史，在许多当事人还健在的情况下，应当写得更好。这一点，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如果不能这样做，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共产党对自己是应讲真话的。我说我们过去的工作难免有错误，如我们陕西的武装起义，实在英勇得很，真是前仆后继，但多次都是失败的。为什么失败，为什么不成功呢？这是有原因的。那时，我们党还年轻，我们的领导者还没有经验，加之错误路线的影响，主要是多次“左”倾路线的影响，特别是革命力量弱小，敌人力量强大，致使多次起义都归于失败。

“左”倾错误路线是最大的主观主义，毛主席主持延安整风总结经验时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就是这个道理。主观主义怎么能使起义成功呢！所以，今天写历史就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光讲过五关斩六将，不讲走麦城，那就不是历史唯物

主义者。我们做地下党的工作，为什么一定站不住脚？或者被敌人抓住蹲监狱、杀头？因为我们执行过“左”的路线，不讲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有一点力量就想暴露，不大喜欢适应反动势力强大的特点，长期蔽隐，埋头积蓄力量。有一点力量就想搞暴动，撒传单，贴标语，就想插红旗。如对《卧虎镇》这出戏，刘庚同志知道，我说过这出戏是反“左”的，这就成为我的一大罪状。我对审查我的那个人说，你要在卧虎镇插旗造反，你要不赶快跑走，你的脑袋就会挂在那里，你竟不懂得卧虎镇在什么地方，就胡乱批判一通。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如果这一个站不住脚，那一个也站不住脚，就跑掉了，工作能做好吗？我就是三三年跑掉的么，跟蒲城的郭炳坤同志一起进了照金苏区。为什么一定要跑掉呢？站不住脚了么！为什么站不住脚了呢？你那一套作法行不通么，就不是后来毛主席讲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所以，要做自我批评。我在地下党时执行的那一套“左”的政策，现在看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就站不住脚。虽然，你主观上是英勇的、坚决的，不能否认，但是你执行的这条政策是错误的，使你站不住脚。现在写党史就要接受这个教训。

我们今天研究党史，有接受历史教训这个意义。如果不能接受历史的教训，我看这个党史研究的重大性就不充分。研究党史，总结历史教训，教育我们自己，也教育后代。如渭华暴动，发生在渭南、华县，暴动虽归于失败，其影响所及，不可低估，经验教训，非常丰富。再如我们陕西暴动确实不少，如麟游暴动、旬邑暴动、清涧暴动、渭北暴动和两当暴动，暴动很多，但大体都失败了。我之所以认为党史研究意义重大，其重要意义之一就在这里。

现在谈党史，绝不是个把人就能谈清楚的。过去留下的文字档案很少，只能靠活人的记忆，而知道历史的人又愈来愈少，而且活着的也多年老，记忆不多。因而，我很赞成集体座谈这个办法。集体座谈，使大家在一起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互相印证，就可以谈得准确一点，个人的记忆一般很难完全可靠。七、八十岁的老头子，五、六十岁的人，多年又不想过去的事情，所以多年的往事就淡漠了，人和事多记不起来，经过也说不清楚，还是集体座谈有好处。我看了有人写的一些回忆材料，有些我看就不可靠，甚至有些吹牛皮的地方，这个就不好。加之有些有私心的人，或者有什么派性作怪，就隐恶扬善，歪曲历史，那就更坏。所以，写历史还要没有私心，这才能把历

史写好。

这是我的几点意见。

（根据讲话录音整理。整理稿已经本人审阅。）

# 对渭南地区党史资料座谈会 工作小组成员的谈话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

中顾委委员 常黎夫

去年一年不在家，对我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情况不甚了了。这次来参加你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的党史资料座谈会，是抱着学习的目的来的。两天来，有些体会，现在谈谈我的来意、观感和希望。

我的来意是看看与会的同志，向来自各地的老干部表示欢迎。同时是来取经的，寻求铺开抗日战争以至解放战争党史资料征研工作的经验。

至于观感，因为仅有两天时间，自然是肤浅的一点。有计划有准备的开好这个座谈会是必要的。你们这个会准备和组织工作好：有题目，有计划，限断清楚，抓住了党组织这根红线，顺序而进，弄清主要活动，方法是对头的，编组是妥当的，又有你们七大员接待（指地委工作小组的七名成员），在一定的范围

说计划是周详的。铺抗战和解放战争，你们带了头。使我对开好大型座谈会的看法有了突破。

现在能请来这么多老干部，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你们要珍惜大好时机，花大力气，抢救活资料，注意条条块块，方方面面，断断续续。自中央到了陕北以后，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斗争丰富得很，这次会上，看到了王俊、史青两位同志的材料，对我很有启发。只要你们舍得花气力，下苦功，善于抓住党组织活动中的大事、重点和关键所在，一定会挖出有血有肉的材料，收到良好的效果。

在抢救活资料的同时，要注意挖掘和利用历史档案资料。省征委现录制回一批资料，如果需要看什么，提出来不挡你们的手。占有资料以后，要加强研究工作，摒弃那些不真实的史料。要做好征集研究工作，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可以把勤奋好学、刻苦实干的年轻同志推荐上来，注意起用五十多岁有真才实学的同志，组成精干实干的班子，我们事业是会兴旺发达的。在征研中，要注意做到领导、党史专职干部和老干部的结合，以保证史料的真实完整。

总之，希望你们善始善终地开好这次座谈会，要兼收并蓄，广征博采，讲究质量，宁缺勿滥，要删繁就简地培育好三秋树。会后，希望你们很好地总结一

下，把经验写出来，在党史资料通讯上发表，把省上的脑子搞活，以推动其他地、市，全面铺开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工作。

# 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好地 下党时期的遗留问题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六日)

中顾委委员 汪 锋

一、座谈会我没有全部参加，参加了几次分组座谈，我认为开得很好，大家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摆出了问题，讲对了大家接受，自己错了，就纠正。

其次，座谈会的形式大小很好，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分组在一起交谈，对历史问题进行澄清，我很欣赏这种形式。熟人在一起有共同语言，会大了不好扯。这样便于谈好，议准确。这符合中央关于征集党史资料的要求。我过去看了很多个人的回忆录，有的写得准确，有些确片面性不小，与历史不符。例如有一个材料说我在汉中高台分粮带了一千多人，实际根本没有那么回事。我在上面写了“完全失实”几个字。我看了这个材料很难过，革命不是风，一吹就

起来了，发动群众需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革命如果那么容易，早就成功了，还用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我们的会议没有发生这类问题，大家都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我刚来的时候，就和白云峰、张济伦同志谈我是来听会的，因为下面大量的具体情况，我知道的很少。过去虽然对汇报都听过，但是忘了。当然，我还有一条任务，就是听了之后说情况，我今天的发言就是谈情况。

我首先谈政策，用当时的政策检查我们当时的工作，来写我们的党史。例如渭南党的工作是怎么做的，如何发动群众，发展了几个党员，我不清楚。如果说，那就是编，我编不了。因此，我主要谈政策。

遵义会议后，我党清算了军事上的错误路线，在政治上也在纠正“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我谈话的精神，我回来都作了传达。一九三六年八月我从保安出来，在白水给阎揆要部队的同志传达了，在西安也给刘庚、王力等部分同志传达过。最近把曾在白水听传达的这一部分同志的回忆整理了一个材料，准备请刘庚等同志也看一看，以便进一步修改。

过去在国民党部队里搞兵变，搞起义瓦解工作，这一次是对凡与我们有来往的部队，凡有爱国思想的军队，就不搞兵变，不搞起义，不搞分裂，不搞瓦解。因此，对杨虎城的部队，必须团结它、巩固它、提高它。重点放在上层，作官长工作。我们过去反对官长，认为党员升了官长，可靠性就小，士兵是无产阶级，可靠性就大。这次重点发展官长。历史证明那个部队有党员军官，特别是有了党员高级军官，那个部队的党组织就能保存下来。这一段历史张策同志已经讲过了，我就不说了。

在方针政策上分三个阶段：

西安事变之后，不久在第二年一月间陕西省委成立。我的任务是全权搞西北军工作，去耀县到许权中、阎揆要部队中工作，不在省委。从保安出发，中央规定的任务很明确，我全权负责西北军党内外的的工作，一直到上层人物，叶帅搞东北军工作，彭雪枫搞阎锡山工作，潘汉年是搞特情工作，我们各人都带有电台报务人员，共有三十多人。

总理谈话有一条，凡是没有被捕过的党员，就一律恢复组织关系，不存在重新入党的问题，组织上比较宽，加入国民党与否，不是主要的。与党失掉联系后，处境很困难，就连当个小学教师，都要参加国民

党。要生存下去，就要有个掩护的职业。就是被发现了，但没有破坏组织，也可以联系。地方的党员，只要碰上，也给恢复。当时的方针很明确，是要把党的组织恢复起来。

西安事变，国共开始合作，我党有许多让步，因为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有许多同志不理解当时的政策，为了共同抗日，实际我们作了一些合理“妥协”，历史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陕西省的党执行了这一正确的政策。

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国民党又搞摩擦，我们对他们提出警告，批评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一九三九年、四〇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对边区形成包围线，在湖南、河南、山西等地袭击了我们。为此中央打电报要我们陕西省委从云阳转移到边区，三九年冬开始搬家，我坚持到四〇年，带部队到安社，后来打开了照金，搬到照金，在四一年又搬到了马栏。当时国民党反共超过了抗日，省委开会写了报告，在一九四〇年四、五月间，由张德生同志到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陕西党抓军队抓的比较狠，主要是抓杨虎城的部队，地方党抓的也是杨虎城的地方武装。毛主席、周总理都说过，陕西党抓武装抓的好，是典型，三十八军是共产党作统一战线工作的典型，中央

有肯定的结论。对地方工作，周总理说陕西党搞两面政权搞的好，把许多党员派去当联保主任，作掩护职业，为党工作，……中央是肯定的。李先念同志曾说：“谁要说陕西党是假的，我就坚决反对。陕西党把我一站一站送到边区，没有陕西党就没有我李先念。”先念同志这几句话十分重要。张德生同志向中央汇报时，根据国民党当时反共的情况，提出是否可以开展游击战争，中央否定了。毛主席对陕西党提出十六字方针，当时主席谈的很全面，有对形势的估计，除了十六字外，共产党员可以参加国民党，入泥而不污，内红外白，结识上层人物等等，应有尽有。在《毛选》提出“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十六个字。在张德生向中央汇报时，有陈云、李富春等同志参加，中间有争论，仍产生了上述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最后决定还是要把陕西省委加强。但工作方法要转变，以斗争求团结，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主席的讲话，四〇年下半年就传达了，文件迟了一年多才印出来。

全国解放以后，镇反就牵扯到一批人，我指的是那些帮助过我们，为我们作过工作的联保主任，被抓了，我们给地方政府讲不清楚，我就让张德生同志把中央的文件印了，那里发生了问题就往那里送。因为

文件印的迟了些，给我们写信的地方很多。有件事要说一说，就是×××和安康的×××，特别是×××于延安抢救运动时，在延安和马栏的大会上，拍着自己的口袋说，我这里都有你们的名字。这样“红旗党就出来了。”康生说“陕西党是于右任党、杨虎城的党”。×××的“贡献大”，给陕西党和许多同志带来了灾难，他应该作出自我批评而没有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我们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进行武装斗争。

这就是我们党根据不同历史情况，政策发展变化的经过。

第三，关于冤假错案和遗留问题：

在这次座谈会上，提到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冤假错案问题，有许多老同志为革命流过血，作过贡献，但是现在还得不到应有的对待。有的家属受到株连，跟着受苦。

有些同志错误是有的，可以教育，主要是量刑的问题，活着的同志应该说几句公正的话。例如尚贤同志是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的党员，行政十四级，为革命作出了贡献，曾被敌人投入监狱，受尽折磨。一九八三年六月，被逮捕，同年十月渭南中级法院认定犯诬陷罪，判刑五年，现已服刑两年多，人已六十七

岁，身体很坏，濒于死亡。许多同志提出应先保外就医，不能让他死在监狱里，其它问题留待查清。

解决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有责任。新同志不了解情况，缺乏历史知识，经验少，但应采取积极的态度，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从中吸取营养，取得一些教训，来提高自己的。

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根子是极“左”，有的人认为“左”的比右的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这种理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实际是形“左”实右，王明的“左”还不是右，最后走向投降主义。（张策同志插话：就是这样的，从历史上看，“左”造成的危害往往比右的大。）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象陕西著名的进步民主人士刘文伯，在西安事变以前就和我们有联系，保护过我们许多同志，救过赵伯平同志的命，他的妻子提出把他的骨灰送进烈士陵园，这个要求完全是合理的。但是一直得不到解决。这难道不是“左”是什么！邵武轩同志不知道，他完全同意，说回去就给办。

造成冤假错案，往往是因为没有完全执行党的政策，毛主席曾说：“要既往不纠”，起义人员和留用人员，不免都有些历史问题，来了运动就抓住人家的历史问题不放，这不是既往不纠而是既往要纠。过去

我们提出有饭大家吃，一碗饭两个人吃。我们现在情况好的多了，反倒不按政策办事，要整人家。

对这些问题不能解决，有的是因为有些同志患得患失，怕自己的官坐不稳，明明知道应该给人家解决，但就是不解决。咱们入党都向党宣了誓，为革命可以牺牲一切，怎么能光考虑个人得失呢！

有的就是因为个人主义，制造冤假错案，例如关于五师过去借钱问题，有的同志说郭建英借钱给五师，是拉票子，那么他这么说就把我们自己拉了进去，我们共产党不成了土匪吗？！这完全是诬陷。这位人士曾对我说：“郭建英的问题就不是李先念同志提出，只要是你汪锋同志说的，我也要执行！”但他出了门却又说：“为郭建英落实政策，不是李先念提的，是汪锋在造谣”。他还说：“如果占地占错了，房子盖起来也可以拆”。我看这不是一般认识问题，是品质问题。对于这种个人主义，我们就是应该揭发。

还有个别人搞派性，可以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但是有些人明目张胆地搞派性，制造冤假错案，我专门写了一首诗，讽刺派性。

在座谈会上有些同志反映，有的同志不敢作地下工作，因为有人认为地下党知识分子多，关系复杂，什么人都接触，甚至接触反动人物，到审查时，就怕说

不清,事实上也是容易挨整。我认为白区党和边区党都是一个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换天”,只是分工不同,不要分什么主要、次要,要教育接班人,谁要分就是对党不忠诚。陕西地下党对革命起了很大作用。李先念同志说:“没有陕西地下党,我一九四六年从南山回到北山,根本是不可能的”。白区党配合了边区党的工作,两个地区的同志千万不要互相瞧不起。有人说你们地下党是土匪,我们是办过“土匪”训练班,但,是办革命训练班。(张策同志插话:蒋介石才把我们叫作“共匪”。)有些同志有怨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请同志们相信,在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下,一切需要落实政策的问题都终将得到合理公正的解决。

(根据讲话录音整理。整理稿已经本人审阅。)

# 谈谈洛川特委同渭南 党组织的联系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六日)

中顾委委员 高克林

参加这个座谈会，我感到很高兴，也很愿意来参加这样的会。但来得仓促，没有准备。在来渭南以前，我参加了晋绥党史资料座谈会。会后才收到你们发来的电报，我向中顾委打了招呼，就匆匆赶来。这几天听了同志们的发言，我认为很好，许多问题已经谈清了。汪锋同志已经谈了很多，解决了许多问题。渭南地委负责同志让我说几句话，我从哪儿谈起呢？就从洛川特委与渭南党组织的关系作一点说明吧。

渭南党的组织是坚强的、久经考验的，渭南是陕西党组织创建最早的地区之一。王璋峰领导的赤水职业学校、华县咸林中学、渭北渭阳中学等是党、团组织早期活动的重要据点。

关于王璋峰建团建党的问题，解放初期，我在最高人民法院任副院长时，董必武同志任院长，我们之间接触较多。一次，我们在闲谈过程中，董老问我：“你认识王璋峰吗？”我说，认识，我和王还有些亲戚关系呢。董老说，当年是我派王璋峰来陕西建党的，还有张宗适是做青年团的工作。同时，中共陕西地区党组织的首创人魏野畴、王复生、王懋廷，经杨钟健推荐，来咸林中学教书。为党在陕西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渭南地区党组织领导了多次革命斗争，如驱逐军阀刘镇华的斗争、驱逐军阀吴新田运动、渭华农民暴动、渭北农民运动等。当时，这些斗争在陕西都有较大影响，并培养出一大批革命人才。如王璋峰、武止戈、张秉仁、校明济、张宗适、王超伯、雷晋笙、杨晓初、方仲儒、屈武、许权中等。这些同志在革命斗争中都作出了较大贡献。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渭南地区的斗争与洛川特委是有联系的。在韩城、合阳、澄城活动较多的吉文超、孟树林等同志都是洛川特委早期派去工作的同志。

洛川特委是什么时候建立的？洛川位于延安南边二百多华里，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洛川地区是党

中央与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往来的必经之地，是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安的缓冲地带，也是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如潮水般涌向延安的最后门槛。该地区仍属敌占区，国民党在这里设有县党部和专署。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叫高仲谦，反共专家，原是国民党米脂县党部书记长。被派在这里的专员姓钟，南方人，很顽固。在这里没有胡宗南的嫡系部队，只有杨虎城的一个骑兵团，团部驻在城内，团长姓孟。然而，我党在该地区的力量却十分薄弱，没有党的组织，仅有少数几个党员。我们驻了一个炮兵团，团长是吴挺同志（朝鲜族人），是红军时期的炮兵团长。为了适应变化了的革命形势，为了加强和巩固党中央与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保护全国各地的大批进步青年学生安全进入革命圣地延安，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在洛川建立党的组织。

一九三七年十月（或十一月），我奉命到达洛川，负责组建了“中共洛川工委”（即“洛川特委”的前身）。工委书记高克林，组织白凤章，宣传胡愈之，团的工作柳树青，工委成员还有罗士英、潘光亚等。工委的任务是：为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把好“南大门”；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保证大批青年学生安全进入延安。工委的对外名义是：八路军驻洛川办事

处，我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驻洛川办事处的负责人。所辖区域是洛川、中部（现黄陵）、宜君、富县等四县。

一九三八年春，洛川建立了县工委，由杨西林、曹志谦（箩客）、雷雨天、潘光亚等人负责。经过秘密工作，不断发展了一些党员，活动区域也逐渐发展到洛川槐北和中部一带，建立了中部工委，由郭景龙（书记）、李士弼、魏明海等人负责。宜君党的组织由强自修、杨西林等人创建。富县当时属于“半苏区”，敌我双方的党、政机关同时并存，我方党的书记是霍士廉，“抗日救国会”主任是罗成德。

中共西北局成立后，一九三八年六月，根据西北局的指示，洛川工委即改名为“中共洛川特委”。由我任特委书记，强自修同志任组织部长，慕生忠同志任宣传部长，杨西林同志任秘书，工作人员有王永录等。特委迁驻洛川后子头。不久，国民党的反动气焰日益嚣张，我们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我方驻洛川的炮兵团、陈先瑞部的警四团和抗大六大队先后开赴前线。因此，特委在洛川的处境日益困难，没有武装掩护，可能随时遭到袭击。于一九三九年秋，特委机关迁驻宜君县店头镇八路军办事处。这个办事处先是李笃信、牛汉山两位同志负责，后来是

还有的同志联名给严克伦同志和我写过信，提出这方面的意见。因为我们不管这一工作，把原信转给了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请他们具体答复，考虑这些同志的意见。这些同志说的主要精神都认为，这两个时期的干部年龄也大了，再过几年有些人可能不在世了，材料就难搞了。近一、两年有的县已在征集研究这两个时期地下党活动和武装斗争史实，我知道西府有几个县就在搞，我还参加了几个县的座谈会。东府有的县，过去给我写信座谈抗日战争初期问题，让我去参加会，如合阳县，因为我对情况知道不多，没有去参加。省上对这个问题也有安排，今年我看到过安排计划，具体的进展情况，我不了解。总之感觉上是，这个工作才开始进行，还没有重点的抓紧搞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的陕西地下党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工作。我认为渭南地委召开这样一个专门座谈这两个时期党史资料的座谈会，说明渭南地委对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抓得紧，进展得快，这对促进全省各级党组织征集研究这两个时期党史资料工作会有重要意义。

同志们都认为，这个座谈会开得好，把很多问题搞得比较清楚了，征集到了好多资料，对一些问题在思想认识上统一起来了。可以说，对进一步系统地研

究这两个时期渭南地区党的活动，立准、立好这两个时期的党史资料打下了基础。

我作为过去在陕西，特别是在陕西地下党工作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党员来说，自己也很关心这个事情，也希望这个工作进展得快一些，能在有更多的老同志健在的时候，把有关问题的资料收集到，搞得准确一些。因为过去地委以下的地下党的活动是很少有文字材料的，主要靠人脑袋记。过几年有些人不在了，想征集也不可能了。所以，我很赞成、拥护渭南地委召开的这次座谈会，给带了个头，也希望其他地、市委抓紧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能够开这样的会来征集、研究这两个时期的党史资料。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再说地下党情况的复杂性。我们写革命史，就要弄清楚、搞确实革命过程中的问题，这个情况是复杂的。我觉得更要懂得地下党的复杂性。革命斗争过程中的事情都是复杂的，而地下党的情况比较来说更有其复杂之处。我这个看法不知对不对？我不是说弄清根据地的、军队里的问题不复杂，而是说地下党的情况更复杂一些，搞清楚、搞确切的难度更大些。在地下党工作活动中，会遇到不少特殊情况，有的问题是容易令人怀疑的，甚至令人难以置信的，若不经长期的斗争事实证明，有的问题可能说不清

楚。地下党的活动、工作有它的特点，在政策上、在工作方式方法上，和根据地、军队中都有所不同，它的复杂性就是由这里来的。这两、三年来，我只是零星地参加一些地方上研究这一问题，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就是很多问题的情况，急忙弄不清楚。你说是不是哪个同志有意在捣鬼呢？我看一般来说，不是的。因为很多问题讨论、传达没有文件，没有记录，就是凭嘴说，嘴说为是，加上事隔几十年了。传达是口头传达，联系是单线联系，有时组织和党员长期在那儿放着，不联系，以后隔了几年，又去找上他。有的同志自个在那里活动了几年，没有上级党的领导，后来又找上了，就由他汇报为是。我们搞过地下党活动的同志都知道，在国民党社会上活动，需要有一套活动办法，如果要长期在那里，就得住在那里，立足到那个地方，呆到那个地方，才能在那个地方活动。不呆在那个地方，你怎么活动呢？你要在那个地方呆，就要有个呆的办法。办法无非是，到群众里头去，依靠社会关系，搞个社会职业作掩护才能进行活动。在座的孟树林同志给人做过长工，做长工还得有人雇请你才能做，当上长工才能和人接触。如果审查时说你是干革命去了，为什么要去当长工赚钱哩？也就可能说不清楚了。在政治上说，有了社会职业，有

的人还要参加国民党，有的当了联保主任，有的当了保长，当了国民党的军官，等等，接触的人、遇到的社会关系就更复杂了。当国民党员，给敌人当干部，还不是政治问题，还不复杂吗？有些情况没有记载在文件上，有的证明人已经死去了，有的因种种原因，记不清楚了，现在要搞清楚，还不复杂、困难吗？

我上个月到宝鸡县委去了几天，参加了县委召开的党史座谈会，其中有一个简单事情，就是宝鸡有没有过中心县委。有人写材料说有，有人说没有，叫我去表态。我说我不知道。说不知道，就是说没有这个中心县委。可是，有同志写的材料说有，有名有姓，谁是县委书记，谁是委员。还说我给开了会，和他当面谈了。我说我不知道，我没有派，也没有给谈话。到会的大部分同志都说没有这个事情。象这种情况现在还不能完全否定或说他是编造的。究竟这问题是怎么回事，可以再查查。中心县委大约要省委决定吧，我那时是个特派员，无权决定这个事情。还可找省委文件去查，如果再查不出来，那就大体可以肯定下来了。我的看法，对地下党党史，要把它搞准、搞好，确实要下更大的功夫，需要较多的时间，因为情况更复杂一些。

退一步说，虽然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比

较来说是近期，不过四、五十年吧，要弄清楚也须费时费力。过去省委是有一些文件，地委以下就没有，各县更是这样。省委有文件也不可能说明各地工作中的每个具体问题，还需要广泛收集资料，邀集活着的人来座谈、来研究更好。例如昨天在这儿谈的陕西省委组织从三七年以来的沿革、变化情况，这个事情本来不那么复杂，有的同志就长时间在省委工作或呆过一段时间，不知在座的各位清楚不清楚，我就弄不太清楚。昨天谈的情况有些还不怎么准确，还需要再进一步座谈、研究。由于时间长了，现存文件是否那么完整，少数人记的是否那么清楚，就难说了，我说这些，是为了说地下党情况的复杂性比较更大一些，这就要求我们征集、研究地下党党史资料的时候，必须要争取时间，有利于搜集到更有用的活资料。

总之一句话，对这个问题不能忽视，不能轻视。说近期，是比较来说的。一战、二战时期还活着的人比较少了，抗战、解放战争时期的人多一点。可是你不抓紧搞抗战和解放战争这两个时期的党史，现在活着的人也要越来越少的。许多同志不是年过古稀，也都是年过花甲了。再过几年，你让谈材料，他脑子不行了，嘴也不会说了，手也写不成了，象**自修同志**、**原路东纵队许天洁同志**等，你让他谈个啥？

我在这里再补充说明一下收集近期资料的难度问题。前两年，我们组织编写解放战争时期西府总队的战斗史，这是更近期的事情，解放战争的事情，而且是打仗的史实，就此弄了两年多，急忙弄不清楚。遇到不少问题，这说这样，那说那样。如乾县支队有次派部分人过泾河，除活了一个人外，全部被水冲走了。这些人叫什么名字，本人情况如何，就是弄不清。因为当时只有一个人活着，现在完全由他说，是不是能说准确？那时是游击队，新成立不久，互相不知底细，连长也记不清他那一连兵的姓名，其他的人更不用说了。时间虽近，也已四十年左右了。对被水冲走的人中，有些人该不该算烈士或者为革命牺牲就有争论。有的说应当算，有的说不应当算，说他参加游击队时间不长。有人说某人过去当过土匪，不能算。有些家属找来说，我爸参加游击队，参加了革命，到边区去了就没回来，后来让水冲走了，还不是烈士。你说该不该算呢？过河是我们派出去的，为打仗的，不是他自己逃跑过河的。现在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怎么解决呢？依我看，只要弄清楚确实是那次被水冲走了，应作个为革命牺牲的结论嘛！以上这是我说的第二点看法。

第三点，关于争取、改造非法武装成为革命武装

的问题。在“七大”以后，根据中央指示，陕西党提出要恢复、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抓紧组织武装力量，在有条件的地区搞武工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所谓有条件的地区，当时指的是沿山一带，北边由黄龙山到麟游山，南边包括秦巴地区边山一带。发展地下党组织，大力争取组织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搞根据地，最后配合野战军，消灭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我记得的不是原话，大意是这样子。那时陕西成立了省工委，省工委研究了中央、西北局的指示，积极部署工作。我是四五年夏季从延安学习回到省工委统战部的。汪锋同志原来是工委书记兼统战部长，这时分配我作了统战部长。当时给统战部的任务主要是，指导各地党想办法抓武装，想办法争取、改造非法武装，把其中能弄进边区的都弄进边区培训改造，视机派出到敌统治区搞武装活动。我记得省工委专门讨论过争取、改造非法武装问题，分析研究了大关中地区和汉南地区的非法武装的性质和枪枝究竟有多少。所谓非法武装是指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不合法的或半合法的武装，包括那些本人在社会上公开的，但他暗藏有不少枪枝。认为这些武装属于中间力量。当时估计至少有五万，也可能有十万枝枪，反正有几万条枪。如果搞好了工作，可以组成强

大的革命武装力量，发展游击战争。同时认为对这几万条枪，国民党那时也在设法搞，收编他们为地方保安队、保安团，利用这些力量压迫群众，进攻我们。这就是说，这些中间性质的非法武装，我们不去把它争取、改造过来，组织起来打蒋介石，蒋介石就要把它争取、编制、训练成打我们的力量。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不应当争取、改造这些非法武装成为革命武装呢？正确的方针应该是，积极争取、改造这些武装，用来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陕西省工委和各级党组织，积极贯彻执行了争取、改造非法武装的方针、政策，在解放战争期间，发展组织起了相当的力量，由武工队发展为游击部队。在敌人占领延安以后，在敌占的地方坚持武装斗争；同时更积极地到国民党统治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成为配合野战军解放陕西的一股力量。我们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现在能记得的名称有：西府总队、渭北总队、路东纵队、蒲白澄支队、长柞支队等。我说的争取、改造非法武装，包括争取、改造国民党的地方保安队、保安团在内。它们虽然被敌人收编了，其性质并未根本改变。

在对待争取、改造过来的非法武装已成为我们的武装成员的处理问题方面，至今有些问题并未完全统一起来，成为解决一些问题的阻梗。例如，陕西关中

地区在一九二八、九年发生三年大饥荒,当时又值蒋、冯、阎战争,甄寿山乘机组织起西北民军反对冯玉祥统治,这时有大量饥民参加到这个军队中去渡荒,迅速发展至数万人,纪律确实不好。后来这个部队为杨虎城消灭、收编;也有大批人回归农村重新作了农民;有的到了非法、半非法部队中去了,有不少人成为非法武装的大、小头子,长期盘踞在一个地方活动。再有一部分就是在国民党各种各样军队里干过事,后来回家了,干农业或其他事情。还有的人过去在国民党军队中给谁背过枪,就是当警卫员,后来弄了几条枪跑回农村,有时也干点无本钱生意,但经常不去搞那种事情,等等。对这些人,国民党统称土匪。我们把他们叫做非法武装,不作土匪看待,是合乎实际的;这又是比较好听的名词,没有侮辱的意思,这样有利于进行对他们的工作。那些土匪成性、根本无法争取、改造的和有些罪大恶极、当土匪发了家的人是极少数,也不容易争取过来,我们并未当作争取的重要对象。对于争取过来的非法武装力量(包括起义、投诚的人),地下党组织也动员了一些农民参加进去,还派干部、党员进去,在其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我们是既争取又改造嘛。改造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基本上按解放军一套制度对待的。在争取、改造非法武装

工作中，一般都是人带上枪支参加革命的，也有只把枪送给我们而人不参加的情况。如乾县支队有个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团长、名叫李尧青的，他回家后，压有几十条枪，在地方上放赌，也派人进边区贩黑货，后来被伪彬县专员抓去枪毙了，说他通共。他兄弟要给他哥报仇，乾县地下党组织派地下党员陈玉林做工作，他兄弟愿意送给我们一挺机枪、几只短枪、十来条长枪。当然这也是有一定条件的，陈玉林同志过去曾给李尧青背过枪，和他们家中人都比较熟识，他们信得过他。

再如岐山大队，有两个分队就是两个民团分队起义后发展起来的。西总的第一支队，是驻扎在边区周围封锁边区的伪保安团董策成那个营起义过来的，经过改造后，成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这个营在驻防边区边境的时候，就与我们建立有统战关系，做了很多革命工作，我们有许多干部都是经过他的防地出入边境的，还为我们运进过很多物资等。这个部队原来的成份也并不是那么纯洁，董策成同志青年时候，就是抢了国民党的枪支仓库，拉到麟游山中干起来的。起义后经过学习、改造，加入了党，担任了西府总队的副司令员，军分区副司令员，副专员，成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事物是在不断的变化，人同样是在不断的变化。有的由不好变好，成为革命战士；也有由好变不好的，由革命变为反革命了。因而说人是能够改造好的，这是马列主义的观点。改造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用马列主义思想，党的方针、政策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嘛，转变其思想作风嘛。总之，改造就是使他由不懂得革命而懂得革命，参加革命，为革命奋斗到底。我看到你们材料里写的蒲城的王振邦，王振邦原来就是一个旧军官。我记得当时派张军同志去做工作，张军写的材料上说的有。省工委还专门讨论了关于王振邦的问题。正因为我们做了他的统战工作，以后他就拿上武器，参加了我们的革命队伍。

这许多事实都说明，过去省工委确定的改造非法武装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陕西地下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了这条方针，经过艰苦工作和战斗，才逐步发展、壮大起各地的地方武装力量，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陕西的战斗中发了光和热。

我为什么今天要反复说明这个问题呢？说明这个问题，是想在征集、研究解放战争这一段党史资料时，对这个问题能求得一个统一认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争取、改造非法武装的方针是“土匪路线”，是违

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因而成为我的罪状之一。这是已往的事情了，而重要的问题是现在可能还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个方针、政策是陕西省工委确定的，我仅是一个执行者。因为我认为省工委这个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请渭南地区各县的有关同志本着总结经验教训的精神加以研究。我的看法究竟对不对？请批评指正。（张策同志：纯而又纯，只能自己不发展。）

陕西省工委确定的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许多争取、改造过来的同志在战斗中为革命流了血，为革命牺牲了。有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他在历史上还有那么一点不清白的地方，但他以后参加了革命，参加了革命军队，在革命中，在战斗中牺牲了。你是承认他革命这一面好呢，还是追究他过去有那么一点不纯洁的情况对呢？我认为，不应再计较他们过去那些问题了。况且基本上他们都是劳动人民出身的，经过党的争取、教育，拿上自己的武器，不怕牺牲，参加了革命，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嘛，应该看到他的进步、发展嘛。他由不革命或者反革命，走到革命道路上来了，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不是讲，马列主义者看问题要看主流吗？他们的主流是拿上自己的武器参加革命军队，立了功，流了血，牺牲

了宝贵生命。（张策同志：没有党的领导，他当然没有政策嘛，他就乱抢乱拿乱杀嘛。你能怪他嘛？你领导，他就是革命的；你不领导，他就自行其是，他就很难革命。这一点，历史上历次革命成败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李自成搞那么大，为什么失败了呢？到了北京，坐到金銮宝殿上去了，为什么垮了呢？没有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对农民的非法武装，对农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的领导，是不能胜利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能胜利的。）

我再补充一点。我记不太清楚了，这将来要请当时省工委的主要负责同志谈或查阅档案。就是省工委确定这个政策，是不是报告了西北局，经过西北局批准，报告了中央，中央知道不知道。我认为，这么大的方针、政策问题，不报告西北局能行？至少是要报告西北局。当时省工委归西北局领导。

我今天啰嗦的说这个问题的意思是，我们写党史，写解放战争时期武装斗争史这一部分的时候，对这些人，就是被我们争取、改造过来的非法武装应有正确的看法，应当看到他们的功绩，看到他们参加革命以后在武装斗争中的贡献。不能歧视，还把他当什么“土匪”来看待，等等。这不符合历史情况，不符合人的发展，不符合马列主义观点。（张策同志：

就是没有进步，也要有个正确看法。他和我们还没有发生关系，我们还没有去争取他，我们还没有影响他。)

解放后镇反的时候，我在宝鸡当地委书记，就在看待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眉县有个武彦昌，确实是眉县槐芽一带的地头蛇，有那么几十条枪。以后，眉县地下党负责人张宏和他交往，进行工作，经常在他那里住、吃，保护上，走时把盘缠给拿上。到武彦昌处住过的不止张宏一人，马德等同志也在那儿住过。张宏以后介绍这个人入党了。解放战争中间，他就在西益公路上截击胡宗南的部队，缴获了一、二百条枪，还有搞运输的车马。解放以后，他把这些全部连武装交给我们政府了。镇反的时候，把这个人镇压了。那个时候，群众中确实有很多人告状，告武彦昌民团过去打人、强奸妇女、胡作非为等罪恶。试想那样一个半民团半土匪的部队里头，当兵的难免有这些事情。我们镇反时，头脑有些发热，有片面的观点，没有掌握好政策，把武彦昌同志镇压了。这次回到陕西工作，我提出一定要给武彦昌平反。起初，有的同志抵触还大，前个时候，据说已经给平反了，承认他是党员。经过几个人证明，当时是张宏同志介绍他入了党的。

我说这个问题是有感受的。前两年征集资料，写西府总队军事斗争史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有好多县上的游击队过去都是非法武装改造编成的。写到那些人在战争中牺牲了，算不算烈士？有的人在名单上列不列？遇到这个问题时争论不休。我看，只要参加我们部队以后，没有什么反革命或其它重大罪行，应当一律算人家是革命的，应当列到牺牲的名单上，有的应算作烈士，他总算是为革命牺牲了嘛。这是我的看法，对不对？大家批评。

最后一点，昨天渭南地委党史办的同志让我说一下沿河地区三七年下半年到三八年上半年澄、合、韩地下党的情况。

我在那里前后有一年左右。开始是去几天又走，以后在合阳住下，也是住个时期又走，来回穿插。我的任务主要是管沿河驻的一七七师地下党的工作。省委还给我说过，要帮助恢复、发展那几个县地下党组织，同时开展、推动沿河几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就我一个人，没有什么组织，我是省委军委的联络员。一七七师师长是李兴中，还比较开明；参谋长是许权中，许是地下党员，单线关系，省委交给我管的。

当时的合阳县长是苏资琛，进步人士。那个县政

府，我们派了一批人到里面去工作。苏资琛给各乡派有指导员，宣传抗日救国，有党员，有进步人士。这里的党员负责人跟我有关系，象苏史青、吴仲秋。部队里的一些党员也协助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

管建勋和翟桢祥在合阳开了个大众书店，原来我不认识他们，经过部队的党员同志给我谈，了解了他们的一些情况，以后我就到那儿去了，而且作为我一个落脚的地方，常在那里住。在王俊来之前，韩城是白云峰，还有苏史青、老段（异文）几个人。澄县是孙健。杨力生当时在一个学校当教员，我是听说。澄县、韩城都去过，经常在合阳。

三八年约在三、四月间，省委派王俊来了。王俊传达省委决定，成立沿河特委，王俊是特委书记，有白云峰，可能还有王博，记不太清了。我也算特委一个成员，仍管一七七师地下党工作。大约月把天气我就调回省委了。以后听说把特委改成地委了，具体日期我记不得。后来省委决定，同时成立了几个地委，这大约是在六、七月间，西府地委就是那时成立的，我就是调作西府地委书记的。

王俊去时，没有地方住，就住在管建勋的书店，王俊作传达的那个会就是在书店开的，王俊来了后，我就把我知道的地方关系交给了他，但军队的关系没

有交，特委不管军队中党的组织，军队的关系仍由军委管。我调走后，省委派张赓良同志接管一七七师党的工作。军队的党和地方的党，当时在组织上没有关系，工作上有配合，主要是搞抗日救亡运动。军队党内部也是按自然关系，有的是单线关系。合阳驻的军队有党员，朝邑驻的那个团也有，大荔也去过，有党员。党员有的是连长，有的是副团长。澄县地方组织可能是一个区，没有正式成立县委，有多少党员，党员名字我说不上来，韩城我也说不上来。白云峰同志可能记得的。

这一段情况，我记得就是这样。完了。请批评指正。

（根据讲话录音整理。整理稿经本人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审阅。题目系编者所加。）

# 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中 的几个方法问题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七日)

刘 庚

上面几位同志都讲了。老同志德高望重，讲得很好，我自己得益不少，学到了些东西，更多地了解到这个地区的历史情况，懂得了搞党史怎么个搞法。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特别是地下党的历史更是如此。这个会议是很重要的，有的同志指出是空前的，意思是以前从来没开过。在会议中间，大家心情舒畅，畅所欲言，欢欢乐乐，心情非常愉快。生活也安排得很好。渭南地委、行署作了最大努力。

渭南地区是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同志们讲了好多。作为陕西党创始人之一王璋峰就出生在渭南地区，就是说，陕西党一开始，渭南地区就有个别党员活动。二战时期有渭华暴动，对中国革命作出了贡

献。抗日战争时期成绩也是很显著的，当时人们所称道的进步县长，好几个都出在渭南地区，如：张锋伯、吕向晨、苏资琛、崔梦博，地上是国民党，地下是共产党。这是县长一级。联保主任这一层掌握的就更多一些。当时通过这些上层关系，和地下党组织的密切配合，利用各种合法组织形式掌握了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平时可以掩护我地下党组织，一旦日寇打过风陵渡，我们就会有领导的、有组织的开展游击战争，迎击日寇的侵略。总之，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是很有成绩的。

解放战争中间，也作出了出色的贡献，象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展、地方武装的发展等就不说了。特别要指出的就是护送中原军区的负责同志去陕甘宁边区，这确实是一个出色的贡献，象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任质斌、戴季英等领导干部都是走这个地区过的。据汪锋同志那天讲，通过他介绍的，说了一百多，总数说不清了。临潼原属渭南地区，现在划出去了。按过去建制，临、渭、二华曾是一个体制。体制现在变了，但过去革命活动是有联系的，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比如陈少敏就是由渭南原上转到临潼县城，在崔明诊同志的诊疗所荫蔽了半个月，后来骑着毛驴进边区了。

我先拣主要的说这些，恐怕细细算起来，光荣的事还多得很。昨天高老(克林)讲了好多渭南地区历史上有名人物。如果谈对革命贡献大小的话，那也不在职位高低，有些应该在历史上写上一笔。我记得在延安的时候，我们作地下工作的在学青红帮那一套的时候，贾拓夫同志讲故事说：当年洪秀全给金陵（就是南京那个地方）埋伏有人，当着太平军打到城门口的时候打不开，就是埋伏的那个人把城门一开，进城了。他说：我们搞地下工作的人，就要等到那个时候起那么个作用，开城门的作用。（吕剑人同志：开城门，放吊桥。）开城门，放吊桥，就这么个意思。开城门的那个人，用来比喻咱们做地下工作那个同志，在咱们党的组织里可能职位不是很高的。但是，在那个紧要关头，在战争中间或者在解放城市上讲，我看就起决定的作用。因此，象这样一些人，不能依职位高低取舍写不写他，而应该看他的贡献、功劳。那天，刘正印同志来我这里，讲他护送李先念、任质斌、戴季英这些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当时他在大王交通站，这里有条红色交通线。他讲的有一点我就很感兴趣。我把那个材料看了一下，写得蛮生动。他仅仅是国民党联保底下的一个班长，手里掌握的“合法武装”有三百多。当时联保主任这个人不是革命的，

在咱们革命活动厉害的时候，联保主任非常害怕。刘正印给他想了个办法，把他安顿在一个很僻背的地方，给他送饭、送衣，还有人警戒，说你在这个地方最保险，现在八路军、游击队活动很厉害，你出来很危险，你躲在这个地方不要动，没有我的话你不要出来，谁叫你都不要出来。那个联保主任以为对他完全采取了安全措施，还很感激。刘正印同志就非常机智地利用联保主任的恐惧心理，采取了隔离措施，他就可以大胆地活动，他手中掌握的三百多人的武装力量，完全由自己调动而遇不到任何阻力。因此，咱们的领导同志路过的时候，尽管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但是很安全，正象李先念同志后来说的，他一路很安全，和解放区差不多。象这一点，一个普通的农民党员，仅仅当了国民党的班长，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起的作用，我看比咱们两个团的兵力作用还大。当时派两个团，由渭南这一路把李先念同志护送过去是不可能的，是打不过去的。总之，在这一方面贡献是不小的，写党史的时候，应当把他写上一笔。

在这两天谈的中间，有这么个感觉，就是历史上的问题，时间长了，过去没有档案，也没有记录，就凭脑子记忆，所以有些记不准确，弄不清楚。不要说有些没有经过的事弄不清楚，就是你经手的事情都忘

了，特别是人物、地点、时间、事件的主要情节，往往说不清楚，有些事很难下定论。历史问题是很难弄的，当时的历史情况就是那个样子。因此，在征集党史资料，写党史的时候，我有这么个想法还可以探讨，就是要抓大的，抓主要的、带实质性的东西。有些枝节问题，能弄清楚尽量弄清楚，弄不清楚就把它放在一边，只要不影响主要问题的性质。

搜集、整理党史资料的时候，要能把这样几个问题弄清楚：一个是组织沿革先弄清楚，比如县委、地委、工委这一类组织机构名称，按照年月排下来，大体上搞清楚。不然这不先弄清楚，当时到底是谁，是那个组织在这里呢，就会胡里胡涂的。没有日子了，有月份；没有月份了，有季度，大体上有那么个眉目就行。

再就是各个时期的干部变动。每个时期的人物，书记、主任也罢，什么员也罢，反正有这么些组成人员。当时机构也不健全，历史情况就是那个样子。你说不健全，人少了，可能更合乎后来讲的“荫蔽精干”的方针，你越庞大，敌人捉起来更快。先要把组织沿革、人事干部变动大体弄出个眉目来。这是一个事情。

二是写在这个期间比较大的事件。这个地方的

“大事摘录”印了一本，有些可以算做大事件，有些算不上大事。对大事件还得进行研究，怎么才算个大事件？影响大的或者搞那么几个条件。要抓大事件。

三是写重要人物。有些重要人物要专门列出来，一个人一个人列出来。

四是写重要会议。在这个地区那个时期开过什么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决定过什么问题，所决定的问题和所做的事对这个地区起了什么比较大的影响和作用，能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有个轮廓。

对于搞党史工作的同志，我有个建议，就是要老、中、青三结合，要把老干部吸收上。不吸收老干部，有些问题，比如象地下党的历史情况，新同志很难弄清。因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就很容易拿现在我们这一套制度、办法去看那个时候，好多东西套不上，好多问题不好解决。这两天会上讲了好多，当时地下斗争的历史情况，限制了当时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和方法，这些和现在都不能相比，这就需要老干部参加，不然事情就不好弄清。

征集党史资料还要多方面征求意见。我最近走了几个地方，人家对我们这个地方征集党史资料有意见。我到山东，见到李书全同志，他原是红二十五军

七十四师的，和陈先瑞、郑位三这些同志都在陕南活动过。他就讲，陕西搜集陕南红军党史，为什么不征求我们意见？我们在那些地方曾经活动过，建立过苏维埃，还有基层组织，发挥过大作用。但是你们写陕南党史，划分老区的时候把几个县没划进去。你不懂就该问问人家嘛。人家提了这么个意见，这是从工作上来讲的。所以，有些问题要多方面征求意见。

最后，这次会议开得这么好，对渭南地委、渭南行署以及与会工作的同志表示感谢！对北京、内蒙等地来的老同志表示欢迎！我的话完了。

（根据讲话录音整理。整理稿经本人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审阅。题目系编者所加。）

## 谈谈地下党的历史作用问题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七日)

刘 邦 显

说几个概括意见。

一个就是关于地下党组织的历史作用问题。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开始张策同志讲了，过去有人说陕西党有三条黑线。“文化大革命”期间，胡炜说陕西党是土匪、特务、走资派。发言中，大家已经用大量事实回答了这些谬论。我想概括说一下，地下党到底干了些什么呢？总的来说，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是我们党的整个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党整个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想应当是这么来看这个问题，这是个总的概念。这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来谈，由于个人的经历和水平有限，很难完全加以概括。

具体地说，一个就是在锻炼、培养、发现干部上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可以回想，现在也可以看到，在

地下党时期,输送到根据地,输送到部队,输送到各个方面,以至于留在地下党继续坚持斗争和解放时搞接收工作的,要说个数目的话就很难统计了,横竖是到处都有。解放以后,建立我们的政权,有相当数量的干部,是由地下党时期培养、锻炼出来的,其中大多数人是为革命奋斗到底的。这是历史事实。

再就是在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方面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在根据地,有报纸,有各种宣传机构。而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边,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这就和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有关系。活动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象办书店,发行报纸,利用进步书刊。还有一些秘密传递的革命书刊,如咱们出的小册子,封面写的《醒世恒言》之类,把它到处传送。象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底下好多人你传我,我传你,最后把书都传烂了,不少人都看到了。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口头宣传,从开始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论持久战,以至后来各个时期宣传、扩大党的影响。正是由于地下党组织的各种宣传活动和根据地的影响,虽然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边,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是心向共产党的。这当然是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同时也是和地下党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分不开的。

还有一点，就是组织群众，联系群众，在我们党和群众之间确实起到了纽带作用。这个联系，包括通过各种活动起到党和群众的联系，也包括通过地下党组织这块根据地和那块根据地之间往来的联系。这里我感到对地下党交通这项工作，决不可以忽视，对他们的功绩不能忘记。现在，好多地下党时的交通员已去世了。过去省委、省工委有一套交通组织，以后各处也都有了交通站、交通员。上下联系，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的联系，再就是我们党和一部分群众的联系，这些交通站、交通员的确起到了大动脉的作用。咱们一个时期提出共产党员要广交朋友，一个人要交多少朋友，各地具体规定不一样，反正你要交好多朋友，这也是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的一种方法。不光是联系基本群众，还要联系各方面的群众。我们党那时搞统战工作，地下党里面也是广泛开展统战工作的。你不搞统战工作，那在工作上就是个弱点，就不好站足。开展统战工作，对于我们开展工作，取得掩护，能够站足，关系很大。统战工作，也包括抓武装工作，以至一部分武装实际上为我们所掌握。刚解放，群众对我们各项工作的支持，象群众的支前活动，同志们都知道，我们是一呼百应，这和前面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各方面的拥护和赞成，也是和前面的工作分

不开的。因此说，地下党在联系群众，联系各方面的群众中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点，就是地下党的斗争活动，为解放和建立新的政权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特别是自一九四八年以后，大家从各方面进行准备工作，从准备干部，保护工厂、学校、仓库，保存档案，不要被敌人烧了，破坏了，一直到谁开城门，谁放吊桥，具体怎么搞，怎么里应外合，都作了必要的准备。咱们这里解放其所以比较顺利，首先是大势所趋，全国整个形势的影响，具体到一个地区来说，也是和这些必要的准备不可分割的。

以上是就自己的体会来谈地下党组织的历史作用，谈得很不完整。总的来说，应该是属于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党的整个活动是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这个地区关于大的历史时期中的具体时期的划分。我们这次着重研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活动，从大的方面就划分为这两个历史时期，我想根据具体情况，是否还可以划分几个不同的具体时期。我认为大体上有这么一些具体时期。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底或一九三九年上半

年，这是我们党组织和各项工作一个比较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把陕西国民党省党部摧垮了，有些邻近的地方也把国民党部搞垮了，这些地方的国民党一下子泛不上来，（张策同志：总的是国共合作。）好多党的基础，就是在那个时期建立起来的。

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到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这个时期里边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也有所区别。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共高潮来了，我们过去一些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就不完全适应了。汪锋同志昨天谈到，这时候向中央汇报，以后提出了“荫蔽精干”的十六字方针。这大概到四一年底前后，西北局文件下来了，形成了更完整的一套。我记得“荫蔽精干”这个方针的传达是在照金的时候，执行的比较早。越早越有利于站住脚，有利于活动，敌人不容易破坏我们。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对的。

一九四二年冬季到一九四四年这个期间，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搞投降妥协活动，形势变得更坏了。（张策同志：抗战的相持阶段。）这个时期提出睡眠、半睡眠。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地下党组织分三种情况：一种是你还搞得比较好，没有暴露，敌人

还没有发现，还可以搞隐蔽性的活动；一种是你已经红了，敌人已经注意你了，弄不成了，进入睡眠状态；一种是敌人还不大注意，虽有些暴露，还可以利用各种方法活动，进入半睡眠状态。大体可划分为这三种情况：睡眠、半睡眠，还有继续搞些必要和可能的活动。这是这两年多的情况。

这里我想说一下，这个时期，我们地下党上下停止了联系，一般地和地下党组织不联系了，上面派的人也不出去或不大出去了。这和当时省委领导的变化也有关系。原来是陕西省委，以后省委和关中分委合并成立地委。我个人看法，对于这一段上下停止联系，我们在主观上有没有可以总结经验教训的地方？据后来我们叫醒大家的时候，好多人有意见，说是寻不着向了。有些人单枪匹马跑进去寻组织，咱们还见到过。有的人就寻不着了。有些人说，虽然睡眠，但我睡不着。这个阶段，总的来说，保存了力量，这个要肯定，大的方针是对的。我说总结经验教训是指上边一度不联系了这么个情况。应当做些必要和可能的联系。所谓睡眠，人睡事不睡，组织睡着，人还可以照样活动。人咋能不活动呢？不过活动方式变化了。这里面的具体情况，我就说不太清楚了。

再就是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开始到一九四七年底或

一九四八年上半年，这算是一段。大概就在这个时期，陕西省工委成立了，开始派大批干部和各地联系，叫恢复、整顿组织，同时发展组织。这个时期，因各地情况不同，活动方式也不一样。我记得那个时期确定，沿陕甘宁边区周围搞武工队活动，这是主要的。在铁路沿线这一带，基本还是按照过去“荫蔽精干”政策办事情，但内容比较更进一步了，在活动上、办法上也不大一样了。往出第一次大批派人的时候，是汪锋同志把人召集起来给讲形势，让做准备，讲以后咋样活动，组织咋样整顿、发展，干些什么事情。当时参加会的好多人放声大哭，说在外边把头提上搞活动，回来以后，还把我们当特务，现在出去谁作保证？汪锋同志作了好多解释，讲了以后，大家说对，咱们走。就这样又都先后到国民党统治区域活动了。

一九四八年或者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以后，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关中东部整个解放，这是一个大发展时期。给解放准备好多条件，多是这个时期搞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这么一些大的时期里面，还可以划分一些不同的具体时期，这是我谈的第二个意见。

第三个意见。这两天大家谈的给我很大的教育、

启发。我们党办事情,处理问题,就是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地下党时候,各个不同时期,总的目的是一样的,但各个不同时期的方针、组织形式和活动办法都有所变化,那是从实际出发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你不能只用一套办法。我谈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两天好多同志都谈到,对地下党斗争里边,不管是大人物、小人物,至今对一些人的问题没有给人家作出公平合理的处理。这是我们现在这些人内心不安的一件事。本来有些人按照那个时期的情况做得完全对的或者基本上是对的,比如在解放初期,敌人反扑,有个同志受组织差遣带人去跟敌人作斗争,打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与敌人有直接关系,一个人虽没有直接关系,但也不是好人。按当时有一条不准随便杀人的政策,给他处分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顶大给他个警告处分就可以了。但以后把他的问题一升再升,连升几级,最后实际成了双开,至今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根本就不是实事求是。这里有种种原因,咱们现在不是要追究责任,而是要历史地看问题,按党的政策给人家解决问题就是了。这一次咱们是座谈党史,类似问题在我们这个区域,会上提到的还有好几个。渭南地委应该负责了解和解决这个问题。(王中林同志:咱们这个会议,专门请了组织部门的同志参

加，一直在听这个会。）原来有个同志把材料给了我，我把材料转给省委主管同志，大体写了这样几句话：这个问题是一看就清楚的事情，这个问题不解决，我问心不安，你在任期间也会问心不安。举这个例子，是说要按实际情况办事情，不能搬用现在的政策、法纪，用现在的情况看过去的问题。（白云峰同志：过去的事一次处理不算数，二次、三次、四次都不算数，还要处理五次，那共产党说话还算数不算数？）现在我们这些人应该说公道话。（吕剑人同志：根本问题是对地下党怎么个看法。有人认为，地下党、地下党员，政治上是不干净的，不可靠的。再一个就是拿现在这一套，或拿边区的一套，军队的那一套来套地下党。地下党确实更复杂，有特殊情况。我们要有个历史观点，咱们叫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处理问题要有个实事求是观点。不然，好多问题就不好解决，就硬是那么干，这是“左”的遗毒。这个问题在党内要好好教育）

最后一个问题，我认为，研究党史，研究地下斗争历史，还有个重要意义。咱们有句话叫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研究、整理、总结这一段的历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对于当前进行理想教育就有针对性。地下党员的理想非常强烈，如果他没有

搞共产主义、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理想的话，那他不会风里来，雨里去，头提在手上，不避艰险，甚至敌人把他逮去，经过斗争，出来以后继续干。再如纪律教育。地下党员纪律性很强，一点儿也不能含糊，说到东就东，说到西就西，说到那里去就那里去。研究这一段历史，对现在进行纪律教育确实大有好处。再如人与人的关系，那时确实是阶级友爱的同志关系，有什么困难，大家互相支援、帮助。咱们不能割断历史，没有过去艰苦奋斗，就没有今天。

总结过去那一段历史，对现在人们确实有很大教育意义，渭南地委党史办搞的那个“八个第一”的宣讲材料，我看了就很受教育，对现在青年一代是生动的优良传统教育。现在有的人好象把一些优良传统的东西忘了。要在新的情况下，结合新的观念，好好加以研究、总结，加强教育工作。

（根据讲话录音整理。整理稿经本人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审阅。题目系编者所加。）

# 回忆洛特在澄、合一带的组织 和游击活动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七日)

孟树林

我是宜君县店头镇人，店头镇现在划归黄陵县管辖，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我的大部分时间在渭南地区一带活动。我是一九四〇年被洛川特委派遣到黄龙、韩城、合阳、澄城沿山一带的，一九四九年离开，前后近十年时间，对这里的同志、群众的斗争精神我一直很怀念，也很感激这里的同志，渭南地委的负责同志让我发个言，从什么地方说起呢？我想还是从我的亲身经历谈一些情况和意见。

一、中共洛川特委在黄龙、韩城、合阳、澄城一带开辟工作的时间。

洛川特委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黄龙、韩城、合阳、澄城建立党组织的？据我所知，一九三八年底或一九

三九年初，吉文超同志接受洛川特委指示来这里开辟工作，创立党组织。（高克林插话：是三八年底。）有的材料讲这里的工作从三七年开始的，这是不准确的。一九三七年，吉文超还在店头一带活动。吉文超同志在这些县做了许多工作，建立了党组织。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对这些地方加强了统治，形势恶化，吉文超同志的工作方法也有些毛病，一些党的组织已有暴露，随时有遭到敌人破坏的危险。十月，洛川特委的秦力生、强自修找我谈话，让我去接替吉文超的工作。我的立足点是黄龙山南部的将军庙。主要任务是整顿党的组织，“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我去后，吉文超同志把情况介绍给我。我记得当时黄龙山石铺吉家河有个支部，将军庙有个支部，高原一个支部，甘诃子一个支部，杨庄一个支部。我的公开身份是在赵万成（地下党员）家里做长工。为了活动方便，便于接头，与各支部负责人蒋世祥、弥榜庆、郭谋娃、赵万成等结拜为烧香兄弟。一九四〇年冬至四一年上半年，党组织经过整顿，把有可能出问题已暴露的人送回边区，大部分荫蔽下来，党的活动暂时处于睡眠状态。一九四一年冬，洛川特委指示我们在继续巩固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向群众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一九四二年党组

织得到较大发展，一些支部变为区委，我记得这时设立区委的地方有甘河、高原、将军庙、石铺的曹店，仅一年，党组织就发展到韩城。这时我再以长工身份活动，感到不大方便。经过和地下党组织的些同志商量，并经过特委的许可，在澄城赵庄以东的高原村开了一个小杂货铺，以小商贩的身份来掩护，进行地下工作，搞了一年多时间。到了一九四二年，我的活动引起了当地一些人的注意，我将这个情况汇报给特委，特委即将我调回特委机关通过地下交通联络，继续负责这一带地下党工作。一九四三年初，延安整风运动已进入结尾，组织决定让我去延安参加整风。一九四三年七月左右，特委将我从中央党校调回机关，又继续负责这一带地下党工作。我回到黄、韩、合、澄沿山一带时，没有任何公开职业来掩护，完全以秘密方式进行活动。在外活动一段时间又回到特委，在机关住一段时间又出来。有的同志讲我在这一带开始当党支部书记，又说当特派员，这是没有根据的。自我到这里来后，一直没有任何头衔和名义。一九四四年党组织在这里进一步得到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也有新的进展，群众与我们的关系也非常好，我们的工作一直伸展到朝邑一带。这时，我已与杨荣轩开始建立了统战关系。杨荣轩在一九三六年崖畔事件中杀害了

澄城早期共产党员张鼎安等同志。因此，他常常流露出怕共产党在这件事情上不会饶过他，出外总是带上七、八个随从。他还常对人说，我迟早非死到共产党手里不可。但是，杨荣轩一直想向我们靠拢。我们抓住这一点，开始做他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王保坤对杨荣轩有一定影响，但这个工作不是他做的，而是我们一个地下党员李毓芳他父亲的关系。李毓芳他父亲与杨荣轩是亲家，关系很好，了解杨荣轩这一心理状态，对杨进行了工作，杨提出要和我见面。我将这一情况派地下交通向洛川特委请示，特委同意我和杨会面。后来我和杨约会在李毓芳同志家里见面，同时杨还向李毓芳他父亲讲，会面的双方都不要带人，但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在谈判的周围布置了一些地下武装。我去后发现他带了四个人，十三支枪。他对我说县上现在注意他了，他是防县上的，请别在意。实际上他对我们也是有戒心的。晚上，我们在李家里谈话，我谈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他说，今后只要你不反共，为人民多做好事，以前的事我们可以原谅的。当时，杨荣轩要送我一支左轮手枪，我考虑到首次相见，要枪不好，就婉言谢绝了。我们就是这样和杨荣轩联系上的。杨荣轩以后表现得很好，经常派人来给我送一些重要的情报。在合阳我们又通过张广文同

志与皇甫庄乡长雷兴初建立了统战关系，我和雷兴初也见过面。当时，澄城、合阳、韩城、黄龙许多伪保长、保队副都与我们建立了统战关系。如澄城赵庄第四保公所在感河村毛老鼠沟查户口时，查出了我们的枪，他们就叮咛：“不要对外说。”因为统战工作的广泛开展。我们基本上是在公开半公开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这对我们地下党组织活动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在日本投降时，仅澄城党员已发展到一百五、六十名，合阳、韩城的就更多了。

## 二、谈一下武装斗争和游击队的建立。

日本投降后，一九四六年秋，王震同志率部中原突围，准备北上。为了配合这一行动，洛川特委指示黄龙地下党组织迅速组织武装暴动，越快越好，并讲陕北主力部队也来配合。当时黄龙将军庙地下党员同志有急躁情绪，没有作好准备就仓促举行将军庙暴动。这个暴动本身还是成功的，但是暴动后如何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同其他地方党组织怎样配合，都还没有准备好。在暴动的第二天，与石堡派来的一个连打了一仗，参加暴动的同志分散荫蔽了。大约在八月份，杨西林、田得霖二同志率领游击队来合阳临时与将军庙暴动的同志会合，不久又举行了皇甫庄暴动，有人说叫起义，我看不能叫起义。这次暴动我们准备

的比较充分，前后大约十天左右时间。乡长雷兴初是统战对象，乡公所有些伪保队副和乡丁是共产党员。晚上我们叫开城门，来个里应外合打死俞振邦，还打死黑池一个查户口的人。暴动后形势变化。中原突围的部队从甘肃回到陕北，陕北的部队没有下来，只剩这个三百多人的游击队单独活动，遇到了困难。为了避免不受损失，杨西林、田得霖和我们研究确定将游击队，暂时带回边区鄜县。到边区后，经过短期整顿，不久从边区下来活动了一个多月，又返回边区。这时特委决定部分游击队留在边区整顿。要我和杨峰同志抽调五十多名精干的游击队员返黄龙沿山一带，以武工队的方式继续在这一带活动。这时敌人以为我们游击队走了，我们同志的家属、当地群众和统战对象也有些失望。我们返回后，杨峰同志在黄龙一带活动，我在澄、韩边山一带活动。我返回后，首先在澄城毛老鼠沟抓住了杀害我留在当地的游击队队长朱子英同志的叛徒姜树亭。故意将他杀死在皇甫庄乡公所门前，专门让敌人看，以示警告。一九四七年七、八月份，洛特派王俊同志在韩城庙河川把洛川特委与东府工委（系统组织）组成陕东工委，正式成立了几个县委，我任澄城县委书记兼支队政委，杨力生是副书记兼副政委，刘振中任支队长。县委组成人员还有孙健

（已逝世）、薛仲舒（已逝世）、问尚贤、周继民（即蒋立祥）。杨峰是黄龙县委书记。合阳、韩城也成立了县委。这时澄城支队大约有六十余人，在黄龙沿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活动。首先将澄城赵庄北高原村的一个保警队全部消灭。不久，与杨力生有直接联系的我地下党武装丁增义也把力量拉起来了，他率领四十余人参加了澄城支队。这时澄城支队大约有二百余人，支队辖三个大队：一大队长周庆才，二大队长韦玉杰（不大准确），三大队长丁增义，后因三大队长丁增义在一起活动不大方便，在白水第一次解放前夕，让他暂回白水边山一带单独活动。不久，我西北人民解放军二、四纵队南下，黄龙石堡第一次解放。残敌连夜逃到赵庄北党家庄，我游击队闻讯后，迅速追到党家庄，袭击了残敌。打死一人，缴获枪支三十余支，电话机二十多部及其他物资。这时我澄城支队声威大震，发展很快，游击队员增至五百余人。我三大队丁增义也由白水返回支队，他没有多大的发展，还是原来的四十余人。这时澄城以北冯原、赵庄、王庄敌伪政权已被摧毁，开始建立我们的政权。合阳、韩城游击队也迅速发展起来。到九、十月间，我主力部队一部分北上，一部分东渡山西。韩城、韩宜、合阳游击队都过了黄河。只有澄城支队在这里活

动。不久，组织上又派雷震东同志参加澄城县委，为副书记和副政委。大约在十一月间，陕东工委派苏史青同志通知我们东渡黄河。我认为过黄河困难较大，有许多不利因素，另一方面又考虑如果澄城支队再走了，这一带就没有游击队活动了，就会造成：第一，沿山一带敌伪乡、保政权很快会重新恢复起来；第二，这里的基本群众和统战对象会对我们大失所望；第三，地下党组织会遭受破坏，游击队员家属及群众会受敌人的报复。

但是我们又考虑到，如果不过黄河，澄城支队在敌人的“围剿”下，能不能坚持下来等，经过反复的考虑，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遇到的情况及各种困难，作了充分的估计，一致认为，我们是能够坚持下来的。其理由：（1）我们的游击队员大多是党员和基本群众；（2）有多年建立起来的统战关系；（3）有可靠的基本群众；（4）有山依托，地形熟悉；（5）最主要的是有坚强的地下党的组织。以上五个有利条件，是我们能够坚持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于是，我们和刘振中、杨峰等同志一起向苏史青同志讲了我们不过黄河，坚持在当地斗争的理由，史青同志无可奈何的走了，并说这是组织问题。这年冬，虽遭多次敌人联防合击，但澄城支队终于坚持下来，

山上敌伪政权始终未能恢复，山下平原一带敌政权虽然恢复，但大多都经过我们许可。实际上是两面应付，不敢做什么坏事。我们这一带的活动，后来，还牵制了胡宗南几个正规师的兵力，这对整个战局也起了一定的配合作用。洛川特委认为澄城支队在那样险恶环境坚持斗争，是正确的。

一九四八年春，瓦子街战役后，我主力部队又二次南下关中，这时澄城支队配合西北解放军二纵队六师，打开了冯原，全部消灭了敌一个保安团，团长吉仲祥被击毙，董宜子被俘，游击队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时，我被正式任命为澄城县县长，雷振东同志和吴卜亭任副县长，新成立了县大队。澄城支队由刘振中同志负责与主力部队配合在澄城县一带进行活动，后编入正规部队。

最后，要说明一个问题，洛特在澄、韩、合、黄龙沿山一带的地下党组织暴露点很多，但地下党组织，始终没有遭受破坏。游击队在敌情险恶的环境下能够长期坚持，没有遭受大的损失，其原因是：

（1）洛川特委对这一带地下党组织活动的指导方针和具体指示是正确的；（2）这一带地下党组织是建立在贫苦农民群众之中，党员的素质好；（3）地下党组织与当地群众有密切而深厚的联系；（4）统战

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护的作用；（5）地理环境条件对我们有利，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活动的地方都是几个县接连的地方，敌人统治比较薄弱。

以上讲的情况，因为时隔已久，记的不太准确，希望了解这一带情况的同志补充和纠正。

（根据讲话录音整理。整理稿已经本人审阅。）

# 在渭南地区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时期党史资料座 谈会结束时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七日)

白云峰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我们这次召开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史资料座谈会，历时七天，今天基本结束了。这次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有三十五位老同志，还有十二位老同志因病因事未能出席。在与会的老同志中，年岁最高的已七十八岁，即是最轻的也年逾花甲，有的公务在身，有的年老体弱，有的抱病出席，从祖国首都，从西北边陲，从古都西安等地返回渭南。久别几十年的老领导、老战友、老同志，故地重逢，忆往追昔，倍感亲切。在座谈会上，大家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认真检查了我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党史专题资料征

集研究计划，详阅细审了部分党史资料，采取了集体座谈的办法，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互相印证，实事求是地总结党的历史。整个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严肃认真。各位老领导、老同志这种一丝不苟的修史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经过这次座谈会，我们基本搞清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渭南地区两县以上党的组织机构、沿革、领导成员，以及管辖区域和活动范围，对重要会议、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要问题，有的已经搞清，有的初步理清了眉目，有的核准了部分史实，有的提供了析疑的线索。会上，各位老同志不仅为我区贡献出许多珍贵的“活资料”，而且为我区党史工作者今后征集研究和使用的党史资料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总之，这次党史资料座谈会，虽然时间不长，任务繁重，但收获却是很大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说它是我区空前的一次盛会，是毫不过分的。这都是各位领导、各位老同志热情关怀、积极支持和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代表地委向各位老领导、老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次座谈会，由于时间短促，有些老同志因事因病未能出席，加上地下斗争情况复杂，年代久远，现存档案资料较少，所以有些史实一时还难弄清。这次会

后，我们决心进一步加强党史资料的征研工作，力争尽快撰写出一部比较翔实、系统、完整的渭南地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同时，也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在不影响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把自己脑海中珍藏的活资料撰写成回忆录，留给我们，也可就渭南地区党史上的某人某事、某个问题、某一活动来信提示我们。会后，我们将就具体史实外出走访，聆听各位老同志的意见。更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对渭南地区的四化建设工作常作指导，经常提出批评。这次会上老同志提出的意见，我们一定认真研究解决，尤为重要是这次会上老同志们谈的宝贵史料，我们将仔细研究整理，编纂成专题、专集和丛书，永久保存，使它在启迪后人，承继革命事业方面，永远发挥作用。

会上，中顾委委员张策、汪锋同志向我们阐明了拨乱反正与研究党史之间的关系，指出要肯定地下党的革命历史，就必须否定极“左”路线强加给陕西党组织的“三条黑线”，阐明了编写历史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要讲真话，要春秋笔。这些教诲，加深了我们对研究党史重要性的认识。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党的革命斗争的经验，接受历史的教训，使我们的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这次座谈会，由于我们准备工作做得差，在老干部的饮食起居方面照顾不周，在材料的提供上还不够及时，在此，谨向各位老领导、老同志表示歉意。

最后，祝各位老领导、各位老同志工作顺利，健康长寿！

# 渭南地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党史资料座谈会 的情况及体会

中共渭南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 一、会议概况

这次会议由十月十一日开始，到十九日结束，历时九天。应邀出席的有三十五位老同志，主要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在我区担任两县以上的工委成员、游击支队负责人和中共陕西省委、关中地委、洛川特委中熟悉我区情况的负责同志以及上述组织所派的特派员、联络员。省委征委主任常黎夫同志出席并指导了会议。到会的同志是：汪锋、张策、高克林、吕剑人、张凤岐、刘庚、刘邦显、邵武轩、孟树林、白云峰、王生荣、孙石亦、杨力生、王博、吴沙浪、范云轩、权秉华、刘玉堂、薛明斋、段杰、刘拓、刘史

智、孙昶、赵一如、程远、刘朱梁、刘振中、王杰、张铁、杨培材、赵群、张超、汪家滨、薛永清、张振侯。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七十八岁，年轻的也逾花甲，七十岁以上的十五人，六十至六十九岁的二十人，平均六十九点三四岁。这些老同志积极支持抢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的党史资料，并全神贯注地参加了会议。汪锋、张策、高克林、吕剑人、刘庚、刘邦显、孟树林等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一些老同志还即会贡献了珍藏的书面资料十一份。这些老同志审查了《渭南地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党史资料征集研究计划》，考订了《渭南地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大事摘录》。曾在省委工作过的十四位老同志在汪锋同志倡议下，还对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共陕西省委组织沿革进行了座谈。有的同志还利用会议间隙校改了十五份材料。会议中共录音七十盘，录像一盘，记录约十万字，整理讲活稿十份约四万字。初步谈清了渭南地区两县以上党的组织机构、沿革、领导成员，以及管辖区域和活动范围；对重要会议、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要问题，有的已初露眉目，有的核准了部分史实，有的提供了析疑的线索，为我们全面铺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党史资料征研工作奠定了基础。会议收效是显著的，基本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 二、开好党史资料座谈会的几点体会

(一) 充分作好准备，勤向地委请示汇报，取得大力支持，是开好会议的前提。

早在今年一月十九日，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就召开我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时期主要党组织（东府特委、路东工委）负责人座谈会，向地委写了请示报告。地委领导同志于一月二十五日批示：请党史办积极作好准备，会期待后再议。依照批示精神，八个月来，地委党史办在主力抓好整党的同时，为全面铺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时期的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内查外访，查抄了十多万字的资料，走访、函访了二十多位老同志，清理了党史部门现有的家底，大体了解了两个时期中我区的主要组织。在两个时期中，我区先后建立了沿河地委、蒲城中心县委、渭华工委、东府特委、黄南工委、韩合澄地委、蒲澄工委、蒲白工委、富铜工委、渭北工委、路东工委、华潼工委、东路工委、朝平工委等十四个两县以上的党的组织。党组织除掌握了几支“合法”武装外，还组建了路东纵队、韩宜支队、韩城支队、合阳支队、澄城支队、朝邑支队等重要革命武装。我

们把已掌握的重要情况及时向地委负责同志汇报。邵武轩同志两次来信建议早些开会，吴沙浪、杨力生、刘振中、孙石亦、赵一如等同志也来电、来信催问会议日期。地委在基本弄清情况和老同志的迫切要求下，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召开这次党史资料座谈会。为开好这次会议，地委党史办还整理翻印了约十万字的重要已故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和综合资料，连同征研计划，一并提供老同志审阅。

## （二）大会小会结合，合理划片编组。

召开我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时期党史资料座谈会的目的，在于通过座谈讨论，切磋问题，互相印证，考订史实，基本弄清我区两个时期党组织沿革、领导成员和“四重”情况，为全面“铺抗战”，立好立准专题资料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顺应当年组织沿革变化情况，从实际出发，划片编组。会议共划分为三组：东北组、西北组和东路组。东北组包括沿河地委、东府特委等；西北组包括蒲城中心县委、蒲澄工委、渭北工委、蒲白工委、富铜工委、路东工委；东路组包括渭华工委、华潼工委、东路工委。各组民主推选召集人。西北组由张策、张凤岐同志主持；东路组由刘邦显、权秉华同志主持；东北组由吴沙浪、杨力生同志主持。各组以党组织为主线，

以“四重”作重点，逐段议清，防止各人泛泛去讲。会议做到了以小组座谈为主，共开会三十二次，其中大会座谈五次，小会座谈二十七次。对于这次座谈会，与会同志表示满意。中顾委委员张策同志说：

“我很赞成集体座谈这个办法。集体座谈，使大家在一起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互相印证，就可以谈得准确一点，个人的记忆一般很难完全可靠。”中顾委委员、中央对台小组顾问汪锋同志说：“座谈会的形式和编组很好，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分组在一起交谈，对历史问题进行澄清，我很欣赏这种形式。熟人在一起有共同语言，会大了不好扯，这样便于谈好，议准确。这符合中央关于征集党史资料的要求。”中顾委委员高克林同志说：“参加这个座谈会，我感到很高兴，很愿意参加这样的会。这几天，听了同志们的发言，我感到很好，很成功，许多问题已经谈清了。”

中顾委委员、省征委会主任常黎夫同志听了三个组的座谈后，在地委工作小组会上指出：“你们这个会有题目、有计划，限断清楚，抓住党组织这根红线，弄清活动，方法是对头的，编组是妥当的。铺抗战和解放战争，你们带了头。有计划、有准备开好这个会议是必要的。准备和组织工作好，在一定范围说计划周详。现在能请来这么多老干部，是形势的需要。”

希望你们开好，把经验写出来，推动一下其他地（市）。”

### （三）倾听老同志意见，努力改进工作。

在这次座谈会上，老同志不仅为我区贡献出许多珍贵的“活资料”，而且对我区的工作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中顾委委员张策、汪锋同志多次强调指出：“要肯定地下党的光荣革命斗争史，就必须否定极左路线强加给陕西党组织的‘三条黑线’”。吕剑人、刘庚、刘邦显等同志阐述了两个时期中渭南地下党大量的斗争史实，列摆了地下党组织的历史作用，阐明了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是我们党整个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征集研究白区党的历史资料不容忽视。与会同志十分重视党史资料为现实服务的问题。刘邦显同志说：“总结过去那一段历史，对现在人们确实有很大教育意义。渭南地区搞的一、二战时期的那个教育材料，我看了很受教育，对现在青年是生动的优良传统教育。现在有的人好象把艰苦奋斗这些东西忘了，要好好研究、总结，加强教育。”同时部分老同志提出给十五位同志落实政策的问题。有的同志建议迅速建设华山旅游区和解决山区人民用电等问题。老同志这些非常宝贵的意见，对我们加强党史征研工作和改进各方面工作是非常有益的。

（四）地委重视座谈会，加强了对会议的服务工作。

为了开好这次老干部党史资料座谈会，地委先后三次讨论会议的开法和内容。在开幕、闭幕式上，在家的地委、行署领导同志全都出席，而且派出两名副书记、一名顾问、两名秘书长，党史办和地委办领导同志各一名，组成七人工作小组。工作小组成员分片下组当联络员。东北片由白云峰（顾问）、王品堂（秘书长）同志联络；西北片由王中林（副书记）、杨中哲（秘书长）同志联络；东路片由石学友（副书记）、马宝庆（征委副主任兼党史办主任）同志联络。大会后勤工作由党启瑞同志（地委办副主任）负责。七人工作小组经常碰头，交流情况，发现问题，立即解决。对老同志的服务工作包干到人，细心周到，整个会议虽然在阴雨天中渡过，但未有一位老同志因天气变化或因饮食、起居照顾不周而染病。

### 三、以积极、慎重态度，努力完成繁重的任务

这次座谈会向我们提出了繁重的任务，主要有四条：1、组织力量将座谈会大量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让有关老同志审订；迅速派人出访，抢救因病因事未能出席座谈会的老同志的“活资料”。2、深挖

历史资料。汪锋同志提出，过去的历史档案不在陕西放，应设法找到。见到原件，老人回忆的疑点就可迎刃而解。3、加强党史干部队伍的培训。要搞清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的党史，必须加强对毛选和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的学习。4、据据老干部的意见，尽快修改《渭南地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党史资料征集研究计划》与《渭南地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时期的大事摘录》，全面铺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党史资料征研工作。

为了承担这一繁重的任务，扎实稳步地铺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党史资料征研工作，在座谈会行将结束时，地委党史办召开了有各县、市委党史办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组织学习了中征委主任冯文彬同志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贯彻中办发〔1985〕40号文件精神的四点意见：

（一）地、县（市）委党史办要层层修改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党史资料征集研究计划，修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大事记述。采取得力措施，抢救“活资料”。有计划、有步骤地铺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

（二）要十分重视现有史料的整理工作和对大

事、重点及关键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史料的使用和工作信息、资料信息的交流工作。

（三）制定全面规划。原则是：条条块块，方方面面，都要顾及，略近详远，体现（各地）特点，力求年内完成。

（四）选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加强学习两个历史决议。

## 悼念许权中同志

汪 锋

将军戎马廿三年，  
踏破山川要换天。  
血洒神州千古重，  
骨安秦岭万秋传。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五日

## 九三起义

刘朱梁

荔北战役炮声响，  
朝邑起义红旗扬。  
一枪未响缚虎豹，  
河西人民歌颂党。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八日

## 浣溪沙

记渭南地区党史资料座谈会

马宝庆

群英集会在渭南，  
战友重逢兴空前，  
共话当年扫敌顽。

秋菊傲霜笑牡丹，  
先烈高风济云帆，  
再展宏图绘山川。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六日

编 辑 马宝庆 蓝志国 薛建辉

张登岳 潘建文

技术编辑 冀 秦

校 对 邢德朝 宋仲义 李海彦

贾巨川 孟宏伟